

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 - 事件系譜學

一、工作，於界限上.....	3
二、諸界限之界限(<i>limite des limites</i>)與致使缺席之缺席(<i>absence absentante</i>)	6
三、界限製圖學.....	9
引用書目	11

摘要

在傅柯的作品中，生命或思想都是一種界限經驗，這意味著：一、這兩者都僅存在於界限之上；二、這兩者都是一種對界限（與在界限上）的複雜操作；三、界線作為一種「致使缺席之缺席」（強化的雙重缺席），是一種絕對虛構，但卻又是思想與生命的載體或材料；四、生命與思想（當其在界限上舒展時）得以外在於無所不在的權力，因為界限不在任何地方，其以強化的雙重缺席置身於絕對的「非場域」，一個純粹的異托邦；五、傅柯式的「存有與思想同一」因此建立（且只建立）於這條由非思所標誌的界限上，確切地說，其就是界線之皺褶作用（一種關於有限性的無限或無定限異質拓樸學）。

關鍵字：界限、系譜學、啟蒙運動、缺席、不名譽者。

Schizo-analyse Michel Foucault IV: Ontology of Limit and Genealogy of Event-Frontier

Abstract

In Michel Foucault's works, both life and thinking are an experience of limit. This statement can be further explicated as follows: first, both of them exist only on the limit. Second, both of them are a complicated operation of the limit. Third, limit, as an absence which makes absence possible (*absence absente*), a double absence, is an absolute fiction; it is nevertheless the material of life and thinking. Fourth, life and thinking, when spread on the limit, can be outside the omnipresent Power because the limit does not exist anywhere; as a double absence, it exists in an absolute "*non-lieu*," a pure *hétérotopie*. Fifth, the Foucauldian formula "being and thinking are identical" is thus built (and can only be built) on this limit marked by non-thinking. Precisely speaking, it is the folding operation of the limit, defined here as an infinite or indefinite hetero-topology about the finitude.

Key Words: limit, genealogy, the Enlightenment, absence, the infamous man

分裂分析傅柯 IV：界限存有論與邊界－事件系譜學

一、工作，於界限上…¹

作為一位嚴肅哲學家，傅柯從不曾與一種界限思考分開。《古典時期瘋狂史》的初版序言宣稱要從事一門「界限的歷史」；《詞與物》以目眩神馳的華麗文筆將「人的存有自身就座於其激進的界限」；《知識考古學》則「決定絕不忽略任何不連續性、斷口、門檻或界限之形式」；現代的性特質在「推擲於其僅與界限的窄仄形式相會的空洞空間」；最後，或許是其哲學遺囑，〈何謂啟蒙？〉要求再確認一種特屬於哲學倫理型（*éthos philosophique*）²的「界限態度」，論文最後一句話正是「我想，必需永遠於我們界限上工作…」³

本文因而將是對界限的複數操作：透過對上述引文的展開（去皺褶），在關於界限的傅柯式論述中奠立問題，同時嘗試在傅柯思想本身的界限上探究實際上蟠踞此思想核心的「經驗－界限」（*expériences-limites*, Foucault, 1994a: 161）。換言之，界限問題正就是用來探究傅柯界限的特異途徑，這個由界限思考所透露的傅柯界限將極適切地被我們運用於對傅柯哲學的研究，而且似乎也僅在此，展現了其思想的特異性。對傅柯而言，重點或許從不在於界限是什麼？在哪裡？也不在於一勞永逸地替理性劃定界限，不在於理性內、外的區隔與判斷；甚至也不在於是否可能跨越界限，如何跨越，或跨越之後是什麼景觀？重點在於且僅在於：如何「於界限上工作」？

「於界限上工作」似乎押注了整個傅柯思想的賭注。在〈何謂啟蒙？〉中，傅柯毫不猶豫地將這種界限態度等同於極高語言強度的「哲學生命」與「哲學倫

¹ 關於「界限」（*limite*）在傅柯作品中的探討，中文世界主要可參考何乏筆的〈美學修養的界限－試論傅柯同性戀工夫與 SM 的關係〉，發表於「哲學與精神分析－SM 工作坊」（2008/06/15，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辦）；本文回顧了關於傅柯「同性戀工夫」與其哲學的相關文獻，也對晚期傅柯對基督教的批判與生命技藝從事思想的關連。此外，J. Miller 著名的《傅柯的激情》（*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從私生活與思想的關係切入，企圖將界限經驗與傅柯的私生活從事理論的串連。本書除了其羶色腥的進路飽受爭議外，從哲學角度對本書最基進的批評，應是 D. Halperin 的《聖徒傅柯》（*Saint-Foucault. Towards a Gay Hag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Halperin 認為 Miller 從「個人病理學」而非「抵抗技術」切入傅柯的生命實踐，似乎正好將傅柯置入其一生所反抗的位置（可參考何乏筆對此公案的評論）。德勒茲在其《傅柯》中則從無限（古典時期）與有限（十九世紀）的角度切入界限的問題性，其較接近本文所欲思考的面向，可參考 *Foucault*, Paris: Minuit, 1986, 131-141（中文版：《德勒茲論傅柯》，台北：麥田，2000，209-223）

² 本文將 *ethos* 譯為「倫理型」，對比於傅柯另一個重要概念 *épistémè*，目前已約定俗成的譯為「知識型」。在傅柯對於性特質史的系譜學式研究中，他似乎極在意各個時代倫理型的斷裂與置換，就如他在《詞與物》中在意的，是古典時代迄今的知識型之更迭與形構。何乏筆在〈越界與平淡：從界限經驗到工夫倫理〉（「界限經驗：傅柯美學工作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10/11。）中，則將 *ethos* 譯為有中國哲學意涵的「風骨」。

³ 分別見 1994a: 161; 1969: 44; 1966: 350-351; 1994b: 233; 1994e: 578.

理」(1994e, 574)；思考，必需成為「邊界上的存有」⁴，其既非內也非外，不是康德式的對跨越知識界限之放棄，也不是任何普同形式結構之追尋，而是質問「在所被賦予我們如同普同、必要及強制之物中，何者是特異、偶然及被歸予任意限制的部分」(1994e, 574)。無疑地，對傅柯而言，「特異、偶然及被歸予任意限制的部分」便指向某種邊界；邊界從來不是距離的概念，不是遠近的函數，更非與中心共構的相對關係，因為由距離、遠近或中心所說明的邊界（即使再怎麼偏斜遙遠）都還是在界限之內，相反的，那些被認為特異或偶然的，那些瘋狂、不名譽、不正常、變態、病態、犯行、自認隱晦的性特質…則以各自歧異的方式迫出了邊界。邊界或邊界的迫出是一場事件，或者其至少具有事件的質地，考古學所實際探究的，不如說就是在時間軸線上的這種「邊界—事件」。由這個角度來看，1977年傅柯發表的〈不名譽者的生命〉及相關的出版嘗試似乎便以一種極殊異的位置明白昭示這種「界限經驗考古學」。其時，【性特質史】卷一《知識的意志》出版未幾，傅柯正坎陷於他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權力論述困境中，從他後來的著作顯示，這篇論文似乎標誌著傅柯從知識論朝倫理學偏航的關鍵轉折，確切地說，論文本身也正介於知識論與倫理學兩者間的幽微邊界。

吊詭的是，作為一種迫出生命、權力、知識界限的特異存有（傅柯似乎比任何時刻更迫切需要逼顯邊界本身），不名譽者並不在於他們是任何大犯罪家或黑色英雄，他們所違犯的也非大奸大惡之罪，這些不名譽者其實非常平凡，完全無足輕重，大部份是，傅柯舉例：「補鞋匠、逃兵、脂粉小販、低階公務員、流浪僧人，一律是狂怒、醜聞或可鄙的。」(1994d : 239)

那麼，為什麼是這些人？或者不如更貼近傅柯當年的困境來設問，對這些「不名譽者」的考古學究竟企圖鋪陳何種必要且迫切的問題性？這些「不名譽者」作為一種概念性人物，是怎麼出現在思考平面上？或者不如問，對「不名譽者」的構思究竟迫出何種效果？而這些效果解決了，在理論平面上，傅柯當時的何種思想空缺，擴展了何種未知的思想邊界？就某種程度來說，我們可以確定對「不名譽者」的理論興趣並不太是歷史學的，因為它其實被放置在權力裝置上來思考。傅柯說：「所有這些註定在一切話語之下通過且從不被提及便消失的生命僅能留下一短促、尖刻、往往是謎樣的一痕跡，在其暫時與權力接觸之點上。」(1994d : 241) 「不名譽者」作為一個概念對傅柯而言具有一種極為獨特而稀罕的功能，他們中介於可見與不可見的切分點，也在沈默與話語成形的臨界線上：可見，因為他們（很偶然也很不幸地）與權力相撞，因此被捕捉、登錄、懲罰甚至殺戮於權力機器之中；不可見，因為他們是如此低賤卑微，如此隱跡於社會最底層的角落，以致於處於前現代時期、仍在發展中的權力機器尚無法完全掌握其動向，甚至無法確知其存在。傅柯說關於這些人的簡短記錄是一種「隱晦之人的傳奇」(1994d : 241)、一種「簡樸的抒情」(lyrisme frugal, 1994d : 239) 或一種「古典風格的美」(1994d : 238)。

對我們而言，「不名譽者」似乎正標誌著傅柯思想在 1977 年時最大掙扎與最大轉折的開始；在這一年，或在這一篇論文上，傅柯的權力概念已歷抵它有史以來的頂峰，權力不再只是政治或國家層級的巨型概念，不再只是被操弄、反抗，

⁴ 1994e : 574。原文為 « il faut être aux frontières »（必需在邊界上），être 在文中作為動詞，但我們在此作了意義的挪置，將其視為名詞譯為「邊界上的存有」。

或鎮壓、宰制的粗糙工具，相反的，而且從《臨床醫學的誕生》（1963）開始，歷經《監視與懲罰》（1975）到《知識的意志》（1976），權力愈來愈微物理學化，愈來愈成為構成一切建制（不僅是國家、軍隊、教育，而且還包括知識與主體）的必要關係。到了1976年，傅柯在權力的構思上已走到極限，或不如說，已走到它的死路，不管是從知識論或存有論的平面來看，權力的微觀理論都述說與建構了一切；一切可述及可視之物、一切主體形式與建構，都指向權力的微關係，而在權力的微關係之外，則是目盲耳聾的永恒晦暗與絕對沈默。從這個觀點來看，「不名譽者」非常巧妙而思辯地卡住了一個至為關鍵且至為怪異的位置，一個在權力網絡上明暗閃爍、若隱若現的偶然時刻，而正是在這裡，在這個特異而疏離（或不如說隱晦）的存有上，無所不在的權力雖然很偶然地捕捉了它（因為酗酒、違警、放高利貸、賣淫、通姦…），但也終於曝露了它自身的邊界，即使這個邊界仍然是在權力這邊的。傅柯在這篇論文裡無疑地仍然是相當悲觀的：不名譽者之所以可見（即使其生命如靈光一現，瞬即消失無踪），只可能有一個原因，在他卑微與暗黑的生命中很偶然也很不幸地與權力相遇了。換言之，仍然是權力促使其可見，促使其得以歷經重重時間來到我們眼前。一方面，權力使其可見與可述，另一方面權力的唯一目的卻正是要殲滅他們。「這些生命僅倖存於與某一僅欲消滅或至少抹消他們的權力的碰撞。」（1994d：243）這些隱晦、黑暗中的生命彷彿在偶然地碰撞到權力的瞬間便被汽化成關於他們存有狀態的一句話或幾行字，轉化為「純粹字面的存在」（pure existence verbale, 1994d：242）。

從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傅柯對「不名譽者」的構思，這是一個非常傅柯式的概念，它僅僅存在於一種高張與衝突的極端條件下：與權力的相遇使其存在，但促使其存在的權力卻只有一個意志，就是消滅它。這就是「不名譽者」，它代表與權力的相遇場域，代表權力延展的末端或邊境。但在這個邊境上，這些「一律是狂怒、醜聞或可鄙的」的不名譽者正釋放他們生命中的特異強度，正面臨被權力收編、整肅或消滅前的最後一搏；當然，很悲傷與不幸的，當我們得以在兩世紀後讀到當年法官、警察或醫生對它們的字面描述時，實際上已是他們被權力機器輾碎後的「純粹字面存在」。

作為一種概念性人物，不名譽者確切指出了權力的邊界；這個單薄、輕賤的存在如閃光般在歷史的星夜裡瞬即熄滅，且除了登錄於官方檔案上的短短幾行字，找不到任何其他存在的跡象。但無疑地對傅柯而言，它卻標誌了那個無遠弗界的權力理論終於也有邊界，儘管跨過了這個邊界一切都將再成為永恆的黯黑與沈默。不名譽者的概念強度正是在此，其使得七〇年代中期封住傅柯思想的這種唯權力論述看到了一個轉機，一個逃逸的缺口，一個或許可以再度呼吸的允諾之地。不名譽者（作為一個考古學概念）僅僅作為一個指出權力邊界的功能而存在，而被設想，而且無疑地，他們是以一種自殺的吊詭方式（偶然地撞擊並被輾碎於權力的網羅上）存在。

然而，正是在這個將立即被權力撲殺與汽化的短暫時刻上，在這個「特異、偶然及被歸予任意限制的部分」的接觸上，迫出了「生命最高張的點」，這些不名譽者的生命「力搏權力，力圖運用其力量與逃離其陷阱」，「這些來回於權力與最不典型存在之間簡短刺耳的話語，對於這些存在，無疑地正是在此授予其僅有的遺跡。」（1994d：241）我們認為，不名譽者的第二個功能似乎在此顯露出來，亦即作為一個概念（或概念性人物），其不僅標誌著傅柯權力論述的不可能邊界，而

且更重要的，從這個充滿偶然、不可能與稀罕的特異點上，傅柯的核心思想開始偏航，從知識論轉向美學，也從存有論轉向倫理學。毫無疑問的，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尾大不掉的權力概念竟然在一個如此無足輕重且卑賤無比的匿名性人物上巧妙地皺褶成一個美學與倫理學的問題；這些低下的不名譽者不僅是一種涉及權力邊界的問題，而且更是一種關乎存在美學或「生命美學」(bio-esthétique)的向度，一首「生命詩」(poèmes vies, 1994d : 239)與「簡樸的抒情」。在思想的運動上，這無疑地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轉身，儘管傅柯實際上仍痛苦地坎陷於權力的理論困境中，儘管我們得再等待七年，這個倫理學與美學的轉向才道成肉身，成為《性特質史》卷2與卷3。但毫不用懷疑地，一種嶄新的理論向度已在這裡、在「不名譽者」上露出它如節慶般的曙色。

二、諸界限之界限 (limite des limites) 與致使缺席之缺席 (absence absentante)

一方面，不名譽者以其突梯的姿態，以極偶然稀罕的機緣，幾近隱跡地散落於歷史疊層中，成為語言的碎片與標誌權力界限的「怪異強度」(1994d : 246)；另一方面，布朗修、巴塔伊、胡塞、沙德等文學作者則各自透過風格化的書寫，既迫出語言的界限，同時也使書寫本身每次都成為一種越界實踐。由是，如果傅柯對不名譽者、瘋子、犯行者的理論興趣在於標誌出某種考古學式的消極界限，其總是源於偶然且是事件性的，那麼對於文學作者的研究則積極指向一種與界限共存的究極動態，且正是在這種匪夷所思的複雜運動中，傅柯將他對界限的思考嵌入最激進的理論平台中。

必需再次強調的是，對傅柯而言，界限從來不屬於任何固著疆界，不是任何被畫定便一勞永逸的極限。界限首先是偶然與事件性的，是考古學必需面對的不可感知及不可視的沈默對象，「其涉及對陳述在其事件特異性之掌握、對其存在條件之決定、對界限最精準之固定...。」(1969 : 40)因此，第二點，界限並不自為存在，對傅柯而言其總是涉及某種「差異存有」(1994b : 238)，**界限便是差異**，等同於某種標誌斷裂、不連續及門檻的抽象之線，其總是偶然及特異的，於是在此意義下逼近界限便是一種極殊異的差異化作用。傅柯無疑地正是在這點上與德勒茲並肩成為同時代的哲學家。對界限的思考並不成為一種單純的疆域限定，不是一種判斷內外的法庭，更非對理性運作的任何允諾及限定，相反且吊詭的，對界限的激進思考來自某種非限定的「對自由之急躁」(1994e : 578)，而正是在此，對傅柯而言，達成「哲學生命」(1994e : 574)，而其無非就是一種對絕對差異(偶然、斷裂、不連續性、事件...)的再問題化。

這個問題化作用，對傅柯而言，就是越界；藉此，傅柯對界限從事最激進的再思考，且無疑地正是在對布朗修及巴塔伊等文學作者的分析中，傅柯具體實踐他臨終前於〈何謂啟蒙？〉所再次確認的哲學倫理：「界限態度」(attitude limit, 1994e : 574)。這是何以〈何謂啟蒙？〉在傅柯著作中佔有無比重要的位置，其提供了另一道澄明的光線，使我們得以用傅柯在自己生命盡頭的視線重新省視他(作為哲學家)一生的思想，而界限態度則成為我們重新褶皺傅柯思想的折返點，其中，六〇年代論述布朗修的〈域外思想〉及巴塔伊的〈越界序言〉成為傅柯呈顯界限態度的重要文本，且正是參照廿餘年後由界限態度所再次強調與贖回的批判/啟蒙意涵，顯露了橫貫於傅柯哲學本身的堅實性(consistance)。因此，當傅柯在 1963

年的〈越界序言〉中寫道：「越界與存有的遊戲是哲學語言的構成，其再生產且無疑地生產它。」(1994b: 244)，透過界限態度的重閱讀，顯然便具有不可小覷的語意強度。越界不僅只是巴塔伊小說中種種惡德及性特質的褻瀆、挑釁與變態操演，而且竟然就是哲學語言的構成與產生。如果我們不回返未來的〈何謂啟蒙？〉，不立足於廿餘年後還被加重強調的界限態度上，將很難理解哲學與越界的這種獨特關係。從另一方面而言，傅柯對文學的興趣（大約是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初期的「文學時期」）其實正如他對歷史的興趣一樣，如果我們透過界限態度加以審視，無疑地就是其哲學倫理的二種實踐：亦即考古學式的，「將述說我們所思、所說、所作的言說視同是歷史事件來處理」，且拒斥一種普同結構的再引入；與系譜學式的，「從致使我們是我們所是之物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作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性」⁵。關於前者，我們曾嘗試藉由一種「內在性知識論」的角度切入，對其具備的現前與在地特性從事分析⁶；本文底下將由界限態度出發，探究這種由傅柯系譜學所具現的、總是頹頹於界限、邊界之上，遊牧於思想與非思之間的界限存有論，特別是由此存有論所引發並促使可能的拓樸學式高張生機表面（bio-surface），其透過種種異質的相位逆轉與移形換位所綻放的哲學生機。

在傅柯的最後文本〈何謂啟蒙？〉中，藉由對界限態度的最終再確認，考古學及系譜學同時贖回了其作為哲學倫理的確切意涵，二者所共同指向的竟是具有啟蒙強度的「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考古學作為歷史事件的獵捕機器，對於被凝視的諸般異質歷史配置（瘋狂、犯行、性特質、變態、不正常…）賦予一種非比尋常的特異強度，相互錯生斷裂的知識型由此滋生確立。作為一種界限態度的方法論，考古學並不是一種史學方法，相反的，藉由對各式異質斷裂、門檻及界限的不捨追尋，其怪異地奠立一種述說不連續性的事件簿，或事件配置；歷史在此吊詭地被轉化為一種事件考古學，偶然及不連續性（「界限的非辯証式語言」，1994b: 244）成為被關注及系列化的唯一對象。另一方面，系譜學被明確設定為對界限的激進探索，其中介於「致使我們是我們所是之物的偶然性」與「不再是、不再作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性」之間；換言之，如果考古學從事於知識型的切分與配置，系譜學則似乎更廝身於知識與無知、思想與非思之間的窄仄地帶，其不再如考古學般意圖提取知識或思想的構成元素，也不分析認識的必要條件或物質基礎，而是直接面對界限本身，企圖迫出不可述與不可視的「兩者之間」（橫跨「我們所是的偶然性」及「不再是我們所是的可能性」），成為一門總是指向（現有認識）域外之學科。就這個意義而言，系譜學成立於其與界限的特異關係中，或不如說，這道總是中介於思想與非思之間的界限（某種指向域外的「兩者之間」）正是系譜學者工作其上的「白色空間」與「凹陷真空」(1994a: 161)。

作為上述意義下的純粹兩者之間，界限並不座落於任何「所是」之處，即使此處是隨機指派或任何想像的極值，因為系譜學並不停駐於「所是」，而是介於「所是」與「不再所是」的不可指定交界；在此，任何「所是」都必需**非辯証式地**將自身推向「不再所是」，其並不是單純的否定或反命題，而是朝向永遠「置於比自己更遠」的「外自身」（hors de soi）。這種動態使得界限本身成為一種「不可克服

⁵ 1994c: 574。關於這段重要引文的分析，也可參考楊凱麟，2006/12，〈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中山人文學報》，23，24-26。

⁶ cf. 楊凱麟，〈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

的缺席」(*invincible absence*, 1994c : 521)，因為一切可指定與可能的在場都同時已無可避免的成為「所是」，而「不再所是」總是在他方，總是差異於既有「所是」，且在一切指定中缺席。由是，在系譜學的凝視下，界限並不因此清晰浮顯，也不再涉及認識的限制與規範，相反的，界限首先是一種闕如，一個赤裸的空無，它以無所在與無所是的不確定性存在，而系譜學作為一種思考此界限存有的哲學，正是傅柯藉由對布朗修及巴塔伊作品的分析所命名的域外思想 (1994b : 239)。

究極而言，系譜學所關注的不再是「自身」(*soi*)，而是「外自身」，不再是任何心理主義的內部性反思 (*intériorité réflexive*)，而是「比所有外在世界更遙遠」的域外思想 (*pensée du dehors*, Deleuze, 1986 : 125)。因此，越界並不在於跨越界限或穿梭內外，更不對立於界限，而在於藉由對界限的無定向探索迫出一種另類空間：缺席的空間。確切地說，作為一種系譜學的獨特姿態，越界迫使界限成為一種不斷向後收束及不可跨越的「空無的無形式在場及此在場的沈默恐怖」(1994c : 531)；由越界所呈顯的不是界限或其超越，而是界限的缺席與空缺，或者應確切地說，界限在此以一種缺席的方式永恒在場，它是從一切「所是」中所虛擬提取的「不再所是」；其不僅不座落於任何確切之處（任何「所是」），而且凹陷成一切實際界限的真空，成為界限的零度與無形式存有。究極而言，如果界限缺席（或界限＝缺席？）成為定義越界的特徵之一，最終被越界所動態迫出的界限存有 (*être de la limite*) 則成為致使缺席的缺席，其不僅缺席與不在，且致使一切可能界限都被抹除歸零。對傅柯而言，系譜學無疑地正是在這個特異的空間（雙重的缺席）中發聲，而這個以不在場在場的空無，就是域外，或者用另一個更傅柯式的詞彙，就是異托邦 (*hétérotopie*)。「在外部發生什麼並不被知道，也不被憂慮：人們外於這個從未被表徵但卻無止境地被其缺席的空白所指明的域外…」(1994c : 526) 系譜學作為一種方法，所呈顯的思想運動因而是一種極特異的內外翻轉（「比最遙遠更遠」的「在地」、「現前」在場）與交互涵攝（實際「所是」中被提取的虛擬「不再所是」），而一切都發生在以雙重缺席在場的界限上：域外作為一種外自身卻以其永遠缺席的空白被指明，「不再所是」以不在場的空洞方式進駐，且吊詭的是，這個在一切「所是」中凹陷出的絕對空無正構成了界限本身的存有，諸界限的界限，缺席的致使缺席者。而也正是如此，越界不可能是一次性行動，不是任何形式的跨越，而是「將界限帶往其存有的界限」，在此，「越界將導致界限蘇醒於其緊臨的消逝上，將其重置於於其所排除之物中（或許更正確地說是於此首次自我認識），檢証其實証真理於其喪失的運動中。」(1994b : 237) 作為「界限經驗」，其不在於迫出任何界限，相反的，在於將界限與「外自身」再串連，進入其缺席的異質空間。有限性 (*finitude*) 在此被無定限所定義，缺席的界限因此僅以不在場的無形式展現其虛擬性。對傅柯而言，越界僅能源自與界限純粹存有的關係，其以一種雙重缺席的在場方式存在。換言之，透過這種怪異的方式，傅柯回應了康德的批判哲學，這就是他所謂的「我們自身的存有論」，其僅透過強化的雙重缺席被迫出與構成：批判，成為一種關於界限的拓樸幾何學；在場的不在場與「比最遙遠更遠」的在地，一切都在界限上…。在一種有限性的存有中，最激進的越界不在於跨越任何實際界限，即使此界限再怎麼遙遠；重點在於致使無所不在的界限終於以缺席的不定限方式在場，在於使界限一再重置於一種自我空缺的運動中，使被不定限化的界限成為存有與思想的動態材料（界限，致使缺席中…），而，我們得以工作其上。

三、界限製圖學

透過越界，系譜學構建了特屬於其自身的另類空間，一個被傅柯命名為域外的異托邦；對這個特異空間（由界線的雙重缺席所動態指定）的研究，則屬於異質拓樸學（*hétérotopologie*）的工作⁷。這種將界限引入思想中的企圖（同時既是思考的界限與界限的思考），無疑的是繼康德之後，經尼采所給予並開啟的嶄新問題面向。究極而言，整部《詞與物》透過對人這個有限性的分析，便是要導向這個最終的開敞，或者不如說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其之所以據有無比重要性，便是為傅柯系譜學奠定其雛型，並終於拉開了他與康德的距離：

「問題不再是：天性（*nature*）經驗如何能產生賦予必然判斷的理由？而是：人如何能產生思考其所不思考之物，如何能蟄居於以瘡啞的佔領模式逃避他之物，如何能以某種凝滯的運動活化他自身的這個形象，其以一種頑固的外部性形式展現給他？人如何能是這種生命，其網絡、其脈動、其埋藏的力量無定限地超越當下被給予他的經驗？他如何能是這種勞動，其需求與其律法如同一種強制於他的外來嚴酷性？他如何能是一種數千年來無他便自我形構的語言的主體，其系統逃避他，其意義幾不可克服地沈睡於他由他的言說所致使片刻閃爍的字詞中，且他自始便被限制要安頓其話語與其思想於其內部，就如同是在這張網的無窮可能性中，話語與思想僅只為了短暫活化一個片段？」（1966, 334；420-421）⁸

一段對其才華與光采毫不遮掩的傅柯式質問，幾句話間便幾乎道盡傅柯哲學所曾激起的抽象風暴；傅柯關於界限思考的問題場域似乎清楚勾勒於此：思考指向一種「頑固的外部性」（域外），思想與非思之間無可指定、不具形與不可見的界限成為這門域外思想所唯一滋生的窄仄空間。傅柯的檔案（視聽材料）就是一種對界限經驗的實証性分析⁹。考古學無疑地離不開一種隨時凝視界限的視域，換言之，考古學較不是一種時間軸線上的逆溯，不是一種歷史學方法的改良或變形，而較是對不同時空條件下的界限製圖學。考古學者就是界限製圖者。一方面，作為探索質異時空下所可能迫出的域外非形式，考古學是一種界限經驗考；另一方面，平行於各式考古學視聽材料的，是一門關於域外非形式的系譜學。由監獄、療養院、學校、臨床醫學、性特質…所羅列出的歷史視聽材料似乎僅是一種表面的裝置，真正被關注的，永遠是由這些材料所逼顯的界限，及此界限所指向的域外。而正是在這塊斷續、碎形與盈溢偶然的事件滋生平面上，一種特屬於思想與非思的「配置」（*dispositif*）被安置起來，界限作為一種抽象之線則以橫貫性（*transversal*）的動態飛越（*survol*）此配置。

然而，如上述引文明白揭露的，傅柯關於界限與越界的哲學姿態正在於：思考所不思考與蟄居於所逃避。這似乎就是現代性的傅柯律令！因為只有在此，在思考與運動的確切無能與去作品（*désœuvrement*）下，開啟了「埋藏的力量無定限地超越當下被給予經驗」之可能；在此，域外侵入，域內翻出，有限性的人轉化

⁷ 可參考楊凱麟，2005/12，〈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五卷第三期，75-97。

⁸ 黑體字為中文版參考頁碼。

⁹ Foucault, 1969: 172-173。

為無定限的力量，哲學成為一種相位逆轉褶皺的拓樸學¹⁰。對傅柯與或許也對其他當代法國哲學家而言，人不是活在康德式的界限之內，而正就活在雙重缺席的界限上，其構成由異質拓樸學所定義的界限存有論：「存有抵達其界限，且界限定義存有」(1994b: 238)，正是在此傅柯從康德偏航，確立其特異的當代手勢。界限(其一方面何處都不是，另一方面卻何處無不是)在思想與生命的無定限力量下被移形換位成最高張的生養平面，一切在此發生。(語言或生命)存有只活在邊界，只作用於非內非外的邊界。「我(思考的我與是我思想的我)應是什麼，以便我**是**我所不**思考**之物，以便我**思想**是我所不**是**之物？」(1966: 335-336，黑體字為本文作者所加)這無疑地是韓波「我是他者」的變型，笛卡兒「我思」的精神分裂，帕門尼德斯「存有與思想同一」的最曲折版本。**而正是雙重缺席的界限上，我是我所不思考之物而我思考我所不是之物**；越界成為迫出傅柯存有論的吊詭運動，去作品化的主體與域外思想成為其產物。而傅柯的配置無非如是，其承載著無定限與無形式的諸異質力量，這些力量一再地被越界所開啟的域外所翻騰攪動。界限在此一方面被席缺化(去作品化)，另一方面則又從中解放一種存有及思想的嶄新與差異可能。

僅僅在界限上，在越界所描繪與促使的思想與生命運動上，傅柯(緊跟著尼采)擲出了他的骰子¹¹，然而，「這並非哲學之終結，而是哲學僅能在其界限的邊緣取回其言說，且重新開始於此」(1994b: 241-242)。如是，越界真理…

¹⁰ 關於「去作品」，可參考楊凱麟，2004 春，〈自我的去作品化：主體性與問題化場域的傅柯難題〉，《中山人文學報》18，29-48。關於「域內」與「域外」的相位逆轉，請參考 G. Deleuze, 1986: 125-128；或，「近與遠在大寫域外之線上的轉換，如同是生與死之考驗，將席捲特屬於傅柯的行動與思想…」，G. Deleuze, 1990: 133。

¹¹ 「思考，就是擲骰子…」，G. Deleuze, 1986: 124-125。

引用書目

- Deleuze, Gilles, *Foucault*, Paris : Minuit, 1986. (《德勒茲論傅柯》，楊凱麟譯，台北：麥田，2000)
- Deleuze, Gilles, *Pourparlers*, Paris : Minuit, 1990.
- Foucault, Michel,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 Gallimard, 1966. (中譯本：《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三聯書店，2002)。
- Foucault, Michel,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 Gallimard, 1969.
- Foucault, Michel, « Préface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 Gallimard, 1994a, 159-167.
- Foucault, Michel, « 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 Gallimard, 1994b, 233-250.
- Foucault, Michel, « La pensée du dehors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aris : Gallimard, 1994c, 518-539.
- Foucault, Michel, « La vie des homes infâmes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II, Paris : Gallimard, 1994d, 237-253.
- Foucault, Michel, « What is Enlightenment ? »,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 Gallimard, 1994e, 562-578.
- 何乏筆，2008/06/15，〈美學修養的界限—試論傅柯同性戀工夫的 SM 的關係〉，「哲學與精神分析—SM 工作坊」，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辦。
- 楊凱麟，2005/12，〈考古學空間與空間考古學—傅柯的「異質拓樸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五卷第三期，75-97。
- 楊凱麟，2006/12，〈分裂分析傅柯 III：內在性知識論與內在性倫理學〉，《中山人文學報》，23，15-28。